

YUANDIAN WENHUA CONGSHU

元典文化丛书

▲姜建设 著

●ZHENGSHI GANGJI

政事纲纪

——《尚书》与中国文化

▲李振宏 主编





政事纲纪

——《尚书》与中国文化

□姜建设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事纲纪:《尚书》与中国文化/姜建设著.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1. 8

(元典文化丛书. 第三辑/李振宏主编)

ISBN 7-81041-710-X

I. 政… II. 姜… III. ①尚书-研究 ②尚书-关系-文化-研究-中国 IV. K22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5164 号

责任编辑:汪维真

责任校对:何晓林

装帧设计:刘广祥

出版:河南大学出版社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475001)

0378-2865100

排版:河南大学出版社电脑照排室

发行:河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版次:2001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43 千字

印张:10.25

印数:1—3000 册

定价:26.00 元

序

公元前 6 世纪前后的几百年间(即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称“轴心时代”),南亚的印度人、西亚的希伯莱人、南欧的希腊人和东亚的中国人,在各自历经长时段的文明积淀之后,不约而同地达到文化史的一个临界点——人们已不满足于对现实的直观反映,而致力于对世界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探索,并思考作为实践与思维主体的人类在茫茫时空中的地位,开始形成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辩证的而不是刻板的关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学说,并首次用完整的典籍将其记载下来,从而使此前处于萌芽状态的、散漫的宗教、科学、文学、史学、哲学成就得以凝集、综汇和升华。这些第一次强有力地歌咏出诸文明民族“元精神”的为数有限的典籍,可以称之“文化元典”^①。

^① 关于“文化元典”的界说,详见拙著《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5 月版。

如果说,《吠陀文献》和《佛典》是印度元典,《古圣书》是波斯元典,《理想国》、《形而上学》等先哲论著是希腊元典,《圣经》是犹太及基督教元典,那么,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堪称“元典”的,首推《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被儒家尊为经典的《论语》、《孟子》、《荀子》,被道家及道教奉为经典的《老子》、《庄子》,被墨家视作圭臬的《墨子》,法家的集大成《韩非子》,都享有“元典”之尊。此外,一些专科创始之作,如军事家鼻祖《孙子兵法》、医学宝典《黄帝内经》也可排入“元典”行列。

元典率先系统荟萃先民智慧,其思想富于原创性,其主题具有恒久性,因而元典有着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的超越性,它们的思考指向宇宙、社会、人生等普遍性问题,在回答这些普遍性问题时,所提供的并非实证性结论,而是哲理式原型;并非僵固式的教条,而是开放性的框架,有着广阔的“不确定域”,从而为历代阅读者和解释者保留了“具体化”和“重建”的无限空间,使之可以纵横驰骋,这便是所谓“《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精华》),以至在两千余年间,元典常释常新。一部中华元典诠释史与整个中国文化史的进程相伴相依,互为表里。

历史的辩证法反复昭示:发展不是简单的生长和增进,它往往不一定呈直线式进步,而是通过一系列螺旋式圈层实现的。这样“回复”便不总是重复往昔,而可能是一种上升的形式,是“唤醒”事物在其开端时即已蕴蓄着的可能性的一种形式。作为由具有自觉意识的人类创造的文化,也生动地展现着螺旋式的发展轨迹,如欧洲“文艺复兴”的崇尚古希腊、“宗教改革”的服膺《圣经》,便是对“元典精神”的发扬和再造,而欧

洲文化正是在这种“回复”中赢得历史性进步的。这种向“文化元典”汲取灵感,获得前进基点的现象在中国也多次出现,著名的“古文运动”便是典型事例。考之以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这种“返本开新”、“以复古为解放”,即回归元典精神以求新变的情形也俯拾即是。当然,现代化是一个文化转轨过程,充满变异与新生,现代生活好比一台巨大过滤器,对往昔文化传统或放行,或阻遏,于弃取间行扬抑之道。近世中国人立足于文明转型和挽救民族危亡的社会实践,选择中华元典精神里的变通哲学、忧患意识、华夷之辨、革命观念和民本思想,并与外来西学的相关部分彼此激荡交融,从而锻造出在近世中国发挥巨大作用的社会变易论、社会救亡论、民族国家论、社会革命论和民主主义。可见,元典精神的选择性发扬和创造性转换,是近现代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题旨,也是今人和后人所要反复探讨和力加实践的。

我从事元典研究多历年所,然困惑处不少,亟望友朋切磋。令人高兴的是,河南大学出版社推出“元典文化丛书”,这使我顿觉良师益友在侧,其欢欣鼓舞自不待言。该丛书将先秦时期应运而生的一批文化元典逐部加以诠释,并阐扬其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及中国民族性格的全方位影响,从而揭示今人精神之来源,民族文化之来龙去脉。这套丛书旨趣高远,而行文切实,为一雅俗共赏佳品。主事者今嘱余为之序,特撰上述,以谢盛意,并藉此就教于丛书作者和读者诸君。

冯天瑜

1994年8月21日于武昌

“元典文化丛书”的说明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不同寻常的年代。在这段长达数百年的历史转型过程中，中国历史不仅在政治、经济上经历着深刻的变迁，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此前处于萌芽状态的各种意识形态、哲学观念、历史意识、宗教神学、文化科学等，也都以成熟的形态凝聚、荟萃，涌现出一批文化元典，从而为后世中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一个义域广阔的开放性基础。这些文化元典，诸如《诗》、《书》、《易》、《礼》、《春秋》、《论语》、《老子》等，包含了后世中华文化的各种文化因子，历史地决定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方向及其文化性质和特征。中华文化传统之所以成为今天人们所熟悉的面貌，中国国民性格之所以显示出大异于西方民族的特征，中华民族之所以能以独特的历史道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即是受惠于这批文化元典的历史奠基。

二千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又处在一个历史的转型期。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必然要求以文化的变革为先导，为前

提,同时也作为最终巩固经济、政治变革成果的牢固根基。然而,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变革,都不可能是对先前文化传统的革除和清洗,而恰恰相反,民族文化的每次更新,都是原有文化传统精髓在更高层次上的发扬和转换,是将原有文化传统在其开端时已蕴涵着的文化意蕴在新形势下重新发现,重新唤起,并赋之以新的生命活力。惟有如此,文化才有更新,才有发展;惟有如此,文化也才有绵延不断的统绪,也才能为全体民族成员认同和承袭。大概正因为如此,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清理,从 80 年代以来,越来越成为引人注目的热点选题。

研究和清理民族文化传统,自然应将目光投向奠定了民族文化传统基础的文化元典,它们之中包含着我们民族文化的基因,蕴藏着民族精神的范型。这一点,似乎不少文化学者都注意到了,因此,近年来出版了不少关于文化元典的通俗读本,白话、译作蔚为一时之盛。然而,民族文化的清理是一项严肃而艰巨的工作,通俗性的讲解和翻译,只是一个最必要的基础;我们还需要去深入挖掘诸文化元典的内在意蕴,特别是这些经典著作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发展,对中国国民性格的塑造,怎样起到了一种奠基性、支配性的作用,也都需要理个清楚;我们还需要知道我们的民族精神之来源以及民族文化传统形成、发展的来龙去脉,从而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史,作出清醒的考察和历史的批判。但这种从历史角度考察文化元典的作用,进行文化精神寻根探源的艰巨工作,似乎还没有人做过。文化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使我们选择了编撰“元典文化丛书”这个课题,并为丛书确定了这样的宗旨:揭示文化元典著作的内在精神,并以主要篇幅阐述这些元典著作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华民族性格的全方位历

史影响,使广大读者能够在一本书中了解一种元典论著的深刻内涵,并将今天的民族精神与之联系起来,知道今人精神之来源,弄清民族文化的来龙去脉,从而更深刻地认识文化元典的历史价值,寻找文化创新的契合点。

“文化元典”是著名文化学者冯天瑜先生创制的概念。“元典”包含有始典、首典、基本之典及大典、善典、宝典等意蕴,亦即圣典、经典之义。文化元典之中应是蕴藏了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这样的典籍并不很多。然而,从民族文化整体去考察,有蕴涵其整体精神的元典之作,如传统的“五经”、“四书”即是;而就某一种文化领域来说,又有该领域的创始之作,如兵学有宝典《孙子兵法》,医学有首创之作《黄帝内经》,神话之源《山海经》,算学之宗《九章算术》,史学的范型《史记》等等。这种某一文化领域的创始作,自然也应填于元典之列。这样,我们这套丛书初选了部分文化元典,分别考察它们对中国文化的全方位影响,以期从一个新的基点上重新认识古代典籍的文化价值。

揭示文化元典的深刻内涵,并着重阐述其全方位的历史影响,并非易事,要有较深的研究工夫;再加上要面对普通读者,又需有将学术成果通俗化的能力。因此,这套丛书的编写,对著作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应对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道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有一概略的总体的认识和把握;应对以往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有全面的了解,尽可能全面地认识元典著作的整体性、全方位的历史价值,并具备驾驭这些成果及将其融为一体的能力;应具备将学术成果准确而不失生动活泼地进行阐述的语言文字能力。然而,在具体写作中,在具体的学术观点上,每个作者又都享有充分的自由,他们可以对自己

著作的立意、结构和行文,进行创造性的构思和安排。因此,丛书的每一本著作,既是丛书整体中的一分子,又不失每位作者个人著作之特色。

本丛书的撰写是一项艰难的研究工作。但为了使它能拥有更广泛的读者,我们对作者提出了思辨性与通俗性、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统一的要求;并力求在编写体例上、文风上照顾普通读者的需求,对一些艰涩的引文尽可能加以译述,或直接译为白话文加以征引。

现在,这套丛书开始出版了。作为一个文化人,当自身的使命感开始化作现实的时候,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喜悦。然而,我不能不说,这套丛书所以能面世,真正对它做出了贡献的是每一位作者,而为其付出了代价的则是出版者。在当前到处都在谈论经济效益的情况下,河南大学出版社欣然承担这套很可能要赔钱的大型丛书的出版工作,表现了他们博大的胸怀和眼光以及庄严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

65年前,郭沫若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时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风雨如晦的年代,然而,却处于一个历史、文化的转型期,一个社会全方位变革的时候,清理古代文化,弄清未来的方向,也是一个极为迫切的任务,我们仍需要为祖国新文化的建设鸡鸣不已。愿我们的“元典文化丛书”能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更新尽一点绵薄之力。

李振宏

1994年9月11日

目 录

序	冯天瑜(1)
“元典文化丛书”的说明	李振宏(5)
一 《书》、《尚书》、今古文《尚书》与 《伪古文尚书》	(1)
1. 《书》与《尚书》	(2)
(1) 丰厚的文化积淀	(3)
(2) 流布之初的几个问题	(10)
2. 《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	(18)
(1) 伏生《尚书》的风雨历程	(19)
(2) 两汉时期《古文尚书》的几个问题	(25)
3. 《伪古文尚书》的现世及其辨识	(36)
二 《尚书》与现实生活	(45)
1. 内容提要	(45)

(1) 《今文尚书》28 篇提要	(46)
(2) 伪古文 25 篇提要	(58)
2. 《尚书》的传播历程	(65)
(1) 出道之初的一路顺畅	(65)
(2) 《尚书》交上了厄运	(70)
(3) 金光大道上的风风雨雨	(74)
3. 现实生活中的《尚书》	(87)
三 《尚书》与中国传统政治	(93)
1.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尚书》与中国 德治传统	(95)
(1) 《尚书》中的德治主张	(95)
(2) 德治主义及其实践	(99)
(3) 德治主义批判	(105)
2. “上帝引逸”——《尚书》与古代的勤政爱民	(108)
(1) 《尚书》中的勤政与保民	(108)
(2) 勤政爱民的历史传统	(113)
(3) 古代勤政爱民面面观	(118)
3. “明明扬侧陋”——《尚书》与古代的贤人政治	(123)
(1) 《尚书》中的贤人政治观	(123)
(2) 贤人政治的历史发展	(127)
(3) 古代贤人政治的简单评说	(134)
四 《尚书》与中国传统思想	(138)
1. “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尚书》 与君权神授学说	(138)

(1) 《尚书》中的君权神授思想	(139)
(2) 君权神授说的实践与发展	(143)
(3) 君权神授学说批判	(151)
2. “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尚书》与 家天下观念	(153)
(1) 《尚书》中的家天下思想	(153)
(2) 家天下观念的历史发展	(159)
(3) 家天下观念的历史定位	(165)
3.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尚书》与传统 民本思想	(168)
(1) 《尚书》中的重民思想	(169)
(2) 民本思想的历史发展	(173)
(3) 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评说	(180)
五 《尚书》与中国传统法制	(183)
1. “虽畏勿畏,虽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 三德”——《尚书》与古代的德主刑辅	(184)
(1) 《尚书》中的明德慎罚原则	(184)
(2) 德主刑辅布局的确立与发展	(189)
(3) 德主刑辅的简单评价	(197)
2. “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 有伦有要”——《尚书》与传统刑罚灵活原则	(200)
(1) 《尚书》中的刑罚灵活原则	(201)
(2) 刑罚灵活原则的历史实践	(205)
(3) 刑罚灵活原则的简短评价	(212)

六 《尚书》与中国史学 (215)

1. “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尚书》与传统史学中的鉴戒意识 (216)
 - (1) 《尚书》中的历史鉴戒意识 (216)
 - (2) 传统史学中的鉴戒意识 (221)
 - (3) 以史为鉴观的简短评价 (227)
2. 《尚书》在传统史学中的地位 (229)
 - (1) 一部标准的“上古史纲要” (230)
 - (2) 倒退史观的样本 (234)
 - (3) 《尚书》与传统史书的编纂 (240)

附录一 《尚书》选择 (246)

尧典(246) 皋陶谟(253) 禹贡(258) 盘庚(264)
 牧誓(270) 洪范(272) 大诰(277) 康诰(280)
 酒诰(284) 召诰(288) 多士(291) 无逸(294)
 君奭(297) 多方(300) 立政(304) 吕刑(308)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314)

一 《书》、《尚书》、今古文《尚书》 与《伪古文尚书》

马克思说过,历史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一天等于二十年,有时候二十年等于一天。雅斯贝斯则说,从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700年间,是目前这一代文明的“轴心期时代”。这都是在讲历史发展的差异性问题的。不同历史时期向后世显示意义的大小在不同领域里显然是有差别的。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史来讲,周秦时代具有特殊的意义。今天所谓的“传统文化”,其核心内涵和基本特征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期凝聚成型的,因此,记录这一时期思想文化演进历程的历史典籍,自然备受历代研究者的关注。当代有的文化史研究者把它们称为“文化元典”,竭力探究其中蕴涵的“文化元”,目的在于为今天的社会生活提供借鉴。这件工作显而易见是有意义的。在这些文化元典中,《尚书》无疑属于“元中之元”,地位显得特别突出和重要。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断限》篇中对此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说法:

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譬夫行不由径，非所闻焉。

“七经”是指儒家学派的七部经典，在刘知几生活的初唐时期，被尊奉为“经”的儒家著作已经从五种扩展到七种，故称为“七经”；而“百氏”则是指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及其以后各位思想家们的著作。事实上，刘知几在这里是用“七经”和“百氏”来总括古代学术的。由于《尚书》是一切学术的渊薮，所以正确的学习次序是，先把《尚书》读熟，然后再读其他著作。平心而论，刘知几的这个说法是很有见地的，《尚书》理应受到人们的重视。至于后来围绕《尚书》而出现的今古文之争及其真伪之辨等等，则是文化元典迷人魅力的一个个具体表现形式，也应该有个历史的说法。因此，这里就先从《尚书》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几个不同名称谈起，进而说到它的思想内涵及其对后世中国历史发展的种种影响，旨在从一个新的角度对这部重要的文化元典作出一个全新的文化诠释。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1. 《书》与《尚书》

《尚书》是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积淀的产物，本来叫做“《书》”，“尚”字是后人给加上去的。起初，它只是一部历史著作，在阴差阳错中与儒家学派发生联系后，这部著作于是被指认为“儒家经典”。出道之初的这些小故事，是解说《尚书》这部文化元典的人应当首先加以述说的内容，因为这是读者首先应该了解的东西。

(1) 丰厚的文化积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这是我们时常讲到的一句话。在那已经逝去的遥远岁月里,早已有人类栖息在这块富饶的东方大地上。元谋猿人、北京猿人、蓝田猿人的陆续现世,无可辩驳地表达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中国是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长期以来一直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着。经过漫长的演化过程,大约在距今五六千年以前,我们的先民终于迈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

社会学和历史学所谓的“文明时代”,指的是阶级社会开始以后的时代,这是相对于原始社会的“野蛮时代”而言的。“文明时代”的构成有许多要件,比如私有制度、阶级分化、国家机器等等,而文字的发明与使用则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学者摩尔根在其名著《古代社会》一书中明确指出,文明时代“始于标音字母的使用和文献记载的出现”。这个说法后来得到了恩格斯的肯定。文字的出现是社会步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尺之一,这种观点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有了它们,思想乃至于文化的交流就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而顺利进行,先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从而得以大大提高。

今天使用的汉字,是我们的祖先逐步发明出来的。据说“古者无文字,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对于原始初民来说,学会结绳记事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然而随着社会交往的不断扩大,人们还是感受到了这种方法的种种不便,于是更为便利的交流工具终于被发明出来。《周易·系辞下》是这样记载的: